

人口与区域安全:理论模型及其在东北亚的现实检验*

于海洋

[摘要] 为了解人口与区域化进程的关联性,本文选取了人口与区域安全这对变量尝试建立一种理论模型。本文认为区域内的人口规模、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都可以通过引发区域内权力结构的变迁或增加国家的安全忧虑的方式,对区域安全施加影响;对东北亚地区人口与区域安全之间现实关系的考察可以检验这种理论假设的普遍性。通过理论假定和现实验证,本文试图说明的是人口要素对区域化进程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区域安全;人口结构;人口规模;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5-0001-05

人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其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人口因素对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也日益凸显。但是,在各国人口分布、人口规模等因素基础上形成的体系性人口结构对国家行为究竟能起到怎样的制约作用,在理论上还缺乏明晰的界定。人口变量作为一种限制性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诸如环境、移民等问题领域中,作为这些领域的相关性背景被理论界认知。本文希望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区域安全作为研究对象,借以厘清人口与区域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关系中的人口变量

人类数量的递增、生产生活压力的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自然界和社会持续紧张的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形成。正是有组织的人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社会压力转移活动,产生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冲突与合作的行为。因此,人口要素长期以来一直是近现代国际体系重要的干预变量和组成部分。康仕利(Kingsley)、赛尔德(Theodore)、麦考斯(Michael S)、摩根索(Mongenthau)以及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等学者都对人口与国家力量、国际格局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要么把人口作为国家力量的组

成部分,要么把人口压力作为国际冲突的诱因;这种零散的分析方式没有把体系层次的人口问题和国家层次的人口问题区分开来,因而也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人口因素与国际关系的分析模型。当前,由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传统国家边界日渐模糊,跨国性社会关系与人口流动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人口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其全球和区域性地位日益凸显。考虑到目前全球化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跨国流动的规模和影响还受制于技术、文化、通讯和交通手段的发展水平,地区仍然是人口因素产生国际性影响的主要单位,所以进行人口与区域关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进而建构一种理论模型是极为必要的。作为一种理论尝试,笔者选择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安全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区域安全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希望由此寻找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

为了清晰而简明地解释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结构主义试图在不同层次的国际关系变量之间建构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在解释如何建立带有科学性的理论时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同时考虑到了单位层次(国家)和体系层次(区域/国际体系)的原因,那么,它就不但能够解释体系中出现的变化,而且能够解释体系中出现的延续性。”^[1]巴赞、琼斯和温特都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重要而独立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08JJDGJW262。

的研究层次,互动产生的“微观结构”介于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之间,是影响国家和体系行为并促成二者变化的原因。这意味着国家间互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分析层次。^[2]在国际体系中,区域恰恰构成了介于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这种“微观结构”。地区内国家间的互动密度通常大于区域之间的事实,使地区变成一个可以同时并对区域成员以及全球体系施加巨大影响的变量。层次分析为我们区分国家层面的人口问题和区域层面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区域层次的人口问题考虑的是地区内各国因为人口形成的互动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这种人口问题尽管从微观视角看也来自各国内部,但它的作用形式却是依靠各国相互关联产生的压力来实现的。由于从区域政治诞生之初起,安全问题就是主要的议题之一,因此考察区域性人口问题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就可以评价出“人口变量”在地区性问题中所占的地位。

二、理论框架的建构:人口结构与区域安全

在区域这一研究层次当中,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领域,诸如区域政治、区域经济领域等等。这些领域作为区域结构的一部分,“通过限制某些行为和惩罚其他行为”^[3]对地区发展的方向施加影响。作为区域发展最优先的议题和最重要的前提,地区安全的实现也深受这些问题领域的影响。如果我们假定人口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那么就必须确定区域性的人口结构有哪些变量直接对地区安全造成过深刻影响。人口结构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复杂,它可以指人口规模、年龄结构、民族结构等多重涵义。纵观人类发展的历程,人口结构中曾经对区域乃至世界安全形成重大影响的人口变量主要有三个:

首先,就是区域层次的人口规模。区域层次的人口规模主要指基于国家间人口相对规模而形成的“微观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个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人口规模的比例通常是处于稳定状态的。区域性人口规模会从两个方面转化为区域安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人口相对规模与区域权力分配的对应关系。第二个就是人口分布与区域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协调关系。在历史上,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与国家对安全威胁的知觉密切关联。就人口相对规模与权力分配的关系而言,人口规模既是构成国力的稳定要素,又是重要的权力来源。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都是政治家判断国家力量的基本方面。米尔斯海默断言,“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财富规模是产生军事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少量

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4]只有存在一定的人口规模,一个国家才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和规模市场,才能为国防力量提供足够的兵员。人口转化为权力资源的能力及其对国家的重要性使每个国家都对人口规模的比例极为关注,人口规模差异一旦加大就会引发国家的安全焦虑。

人口分布与资源分布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我国有学者把能源安全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方面,并认为“现代意义的能源安全是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的有机统一体”。^[5]表面上看,能源安全问题是由于各国对稀缺能源的竞争造成的,但实质上能源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单位人口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和人口规模总体的上升。由于大量能源基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同时自然资源的地理分配与人口地理分布不总是重合的,这就使能源需求与人口的矛盾具有某种刚性。在同一地区内,不仅存在着能源供应方与消费方的矛盾,还存在着能源供应者内部和消费者内部的矛盾。一旦人口压力加剧,人口危机与能源危机就可能重叠形成地区性安全冲突。二战前日本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就为泛亚论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土壤。^[6]总体而言,国家基于人口问题产生的担忧或受到竞争性政治环境的影响,或与能源稀缺等因素相互叠加,经常会产生对本国居于弱势的担忧;这种恐惧心理进一步发展就会使一个国家为了改变劣势状态而采取改变现状的政策;一国改变现状的冲动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就产生了地区性的安全竞争。在这一冲突链条中,区域性的人口规模是导致冲突产生的诱因,而国家层次的人口规模则成为国家重要的权力资源。

人口问题中第二个可能影响区域安全的典型变量就是人口流动。人口的跨国流动甚至人口在一个国家国境地带的流动都会给邻国带来安全压力。亨廷顿指出,“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人口的流动经常伴随着暴力与冲突,欧洲的殖民过程就是人口的地理扩张的过程。亨廷顿甚至强调,“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惟一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志”。^[7]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人口跨国迁移的规模,这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大规模的移民既会给移民输出国带来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流失的问题,也会给接受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结构带来重组的压力。由人口流动引发的民族、文化、就业等一系列矛盾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输出国与接受国的介入。可以说人口跨国流动造成的影响是全面而持久的,人

口流动与反人口流动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这种斗争极大地考验着各国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稳定程度。一方面,人口迁移会带来地缘政治效应,这种流动既带来了近现代欧洲边界的扩张,也带来了美洲大陆的开发和亚非拉地区的被殖民化,最后重写了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特定国家间的人口流动还会诱发领土与民族纠纷,进而带来战争。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还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反弹。霍夫曼认为因为移民带来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两个方面,^[8]移民对母国的感情与其对所在国政治的影响力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第三,区域性人口结构中的年龄结构和民族结构也会对地区安全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地缘政治学者指出,当今国际社会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以不均衡增长为基本特点的,不均衡增长又带来了严重的年龄结构失衡现象。“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迅速‘幼年化’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9]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保障就业的巨大压力,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社会活力的匮乏。从国家层次看,无论人口的老龄化还是幼年化都会导致国内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状态,这种国内压力经常会刺激国家利用外交政策转移压力;从区域乃至国际层次看,一旦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区域经济活力就会受到严重干扰,而且在人口流动还受到很大限制的今天,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往往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限制产业转移、保障绝对利润用以支付高额的社会保障成本。这种试图把不平等经济结构固定化的企图必然会阻碍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也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进而增加国际社会不稳定的程度。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构成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安全局势。汉斯·摩根索详细地描述了民族主义发展与国际冲突加剧之间的关联。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倾向本来就长期存在,尤其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的地理分布经常是跨国境的,民族成员的跨国流动又会加剧各国民族结构的业已存在的复杂性。在不同民族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波动的情况下,各民族的政治诉求经常会超出一个国家范畴上升为区域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各国的民族政策出现偏差,民族矛盾与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就应运而生。欧洲历史上的犹太人问题和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问题都曾产生过冲突性的国际后果。

区域层次人口结构尽管表现为多个侧面,其本质都是人的发展与区域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的不平衡

增长和流动需求,与民族国家对个体活动的限制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反映到国际政治领域就形成了安全问题。人口变量对区域安全多维度的影响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人口问题带给国家的压力引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人口需求的变化,这就会对国家的供给能力产生压力。一旦人口问题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压力超过国家自身结构力所能及的范围,这种紧张关系就会转化为不稳定因素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基于人口因素产生的安全问题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必然会通过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传导到区域层次,对区域安全形成挑战。第二种类型是由人口问题对地区均势带来的影响导致的。现代市场经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知识经济强化了人的作用,加大了人对国家力量的影响,人口要素作为国家力量的构成要素其地位是日益提高的。因此,区域性的人口结构也将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样,对地区权力结构图谱的勾画施加影响。而按照经典国际政治的观点,权力结构的变化几乎必然导致安全形势(尤其是相对安全)的波动。

总体看来,以区域层次变量出现的人口结构会持久地对国家形成压力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政策选择;国家基于人口压力作出的政策选择又会反过来建构区域结构,影响区域安全形势的发展,这就产生了从区域层次到国家层次的“因果性关系”。^[10]

三、实证性探讨:东北亚人口问题 对区域安全形成的挑战

理论上人口结构的地区性变化,要么通过让国家结构感到压力因而产生安全忧虑,要么是通过权力结构施加影响影响地区安全;但是在具体的地区化进程中,不同的地区在人口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各有不同,人口结构各个侧面所起的作用也是此消彼长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观点的提出在成为科学前需要接受实证的检验,大量经验事实对解释和检验某种观点的科学性来说是必需的。^[11]当前东北亚区域化进程正处于深化时期,传统的经济合作极大提升了地区内国家的政治协作水平和区域共同发展的前景,但是合作层次与深度的徘徊状态也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中展露出来。历史争议、领土争端以及最近发生的朝鲜试射火箭事件都显示大量的传统安全议题还未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北亚地区人口结构与区域安全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阐释人口要素在地区结构中的地位,也有助于探讨区域合作路径如何超越

传统议题束缚、进行创新的问题。

上文列举的人口结构与区域安全之间的各种关联性,在东北亚地区都不同程度的有所体现。但是当前东北亚地区人口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还是集中于增长不均衡、流动不均衡和结构不均衡三个方面。三大失衡现象对地区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构成了巨大挑战。人口结构与地区安全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以军事和政治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安全方面,人口因素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失衡对权力结构的影响上。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中人口变量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关系上。巨大的财富需要巨大的人口规模,但是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一定产生巨大的财富,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拥有大致相当的技术水平后,人口规模才会给国家带来更具优势的财富规模及军事能力。^[12]东北亚地区近年来体现了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以GDP总量衡量的国家实力却无法反映国家间真实的权力对比状况。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北亚各国无法准确评价人口规模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不但拥有基数庞大的劳动力,还在劳动力素质上取得了极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过分庞大的人口总量又抑制了国家力量转化为“可支配国家力量”的能力。日本也面临同样问题,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沉重社会负担也使日本的可支配国力难以准确判断。事实上,各国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升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人口规模或年龄结构带来的压力,^[13]这一问题在人口结构与地区整体结构之间关系没有明确之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无从判断的。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在人口问题上几乎都有显著的弱点,又有各自的优势,这使各国很难对权力结构现状的认知达成共识。以日本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担心两国国力均衡被打破为例,事实上对中国而言,高速增长有时只是为了实现吸纳新增劳动力保障就业这一有限目标而已。^[14]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使政治结构的真实状况模糊化,这加剧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彼此政治地位的认同困难,自然也影响了各国政策的理性程度。因而使基于权力平衡和相互认同而达成的地区安全实现更加困难。总而言之,人口结构在区域结构中的缺位使区域性权力分配的真实状况无法体现,也使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缺乏了一个重要依据。

第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发展压力,进而对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产生了重

要影响。巴里·布赞认为跨国交流中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问题对安全形势的影响不亚于传统政治和军事问题。^[15]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化重要性逐渐凸显,而且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带有区域性的特征,产生于国家间的互动,也需要在互动中寻求解决之道。由于非传统安全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联,人口问题自然成为其重要议题之一。当前东北亚地区人口结构与地区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这种紧张关系是难以依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的。人口的不均衡增长、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紧张关系,一系列因素既困扰着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又增加了区域发展的成本。在区域人口规模总体增长和人民对发展预期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都在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人口与自然界、社会的紧张关系会使功利性的短期发展与可持续的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这种“发展的不安全”是东北亚区域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在人口压力与发展压力的矛盾关系中,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东北亚区域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 人口流动的需要受到压抑。无论是人口规模的不均衡增长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会产生人口流动的需要。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都面临着人口规模过小无力将潜在的区位优势 and 能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而中日或受制于过大的人口基数,或面临劳动力短缺需要产业转移的压力。从国内看,劳动力过剩或稀缺都会降低国民经济的活力。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分析,人口无法自由流动意味着地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要素无法实现合理配置,资源配置的缺陷又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长期无法解决既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又催生了非法移民等问题。缺乏制约的非法移民不但对各国的治安、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冲击,也将构成国际冲突的潜在诱因。^[16]

(2) 人口分布与能源安全的矛盾。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既与经济规模相关,也和人口基数有直接关系。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分布与能源的地理分布不相吻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东北亚缺乏协调性的能源政策。中国和日本作为地区内两个能源消耗大国,都积极地试图利用俄罗斯和蒙古境内的丰富自然资源,但竞争性的能源政策不但加剧了双方的负担,而且使双方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同时,中日积极的能源政策虽然使供给者获利,但俄罗斯和蒙古也很容易产生过

度依赖中日市场的忧虑,能源的供求双方并未因为能源合作增加安全互信的程度,反而出现了“不均衡相互依赖”的戒备心理;而且俄罗斯和蒙古缺乏劳动力的现状也限制了他们供应能源的能力。可以说,东北亚地区的人口不平衡增加和不均衡分布增加了能源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提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

(3) 人口与环境安全的矛盾。生态系统的循环会将一个国家的环境风险传递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因此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跨国性的。环境合作与环境对话目前属于东北亚区域合作中较为活跃和积极的一部分,但是环境保护中最重要的责任分担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环境问题的解决表面上是环境保护问题,但实质上却与区域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协调密不可分。当前的环境保护政策集中于降低人口单位能耗方面,却忽视了由于老龄化、人口分布失衡及人口无法自由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必然会增加经济产出中的能源消耗。

四、结论:建立人口问题的研究与政策框架

人口问题在区域主义的议题中缺乏应有的地位是当前区域安全研究的一大缺失。在众多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人口结构往往作为一个隐含的变量存在,这样不利于我们对人口问题做出总体把握。人口要素的政治性在于它对国家政策选择和区域关系的影响能力,但这种影响力经常因为与其他因素混同在一起而被低估。为了清晰认识到人口因素对区域性问题的意义,就需要区别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理论层面的人口与区域关系,第二个就是现实中的人口因素与地区化进程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区域主义研究一个功能区的合作如何外溢至其他区域,进而促进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人口结构被区域主义研究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人口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进入理论框架当中。地区性的人口结构究竟以何种方式与其他功能区域相互作用,需要进行更多的学理性探讨并形成某种共识。在具体的地区化进程中,人口结构有时与其他因素共同对区域发展和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有时又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独立发挥作用。人口结构的不均衡带有很强的稳定性,不是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但是人口政策的区域协调却

是一个灵活的过程。各国在人口流动、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实践。中日在长距离跨国境大气污染(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问题和沙尘暴问题、酸雨问题上的对话合作都涉及到如何促进人类与环境关系更加和谐的议题。当前建立人口问题的政策框架最优先的任务就是扩大人口合作的范围,建立更多的议题并形成可以遵循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注释]

- [1] [3] [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第58页。
- [2]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91页。
- [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 [5]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M],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 [6] Richard H. Minear,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96-198.
- [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 [8] Stanley Hoffmann, "The Emerging World System: The Case For Leadership", *Foreign Policy*, Winner 1990.
- [9] 国玉奇、B. IL 丘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M],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 [10]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第97页。
- [11] Larry Arnhart, "The New Darwinian Natur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6).
- [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第84—85页。
- [13] Z. Griliches,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10).
- [14] 1962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认为,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2的反比例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实现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参见陈涛、王健:《浅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问题》[J],《现代商业》2009年第5期。
- [15]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Chapel Hill, N. 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3, pp. 64-66.
- [16] 孙琼如、侯志阳:《中国非法移民问题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09-05-23

修改日期:2009-07-06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Northeast Asia

by Yu Haiyang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two variables,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are chosen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article holds that population scale,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reg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ir impact on power structure or on security anxiety.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problem in Northeast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e author's hypothesis can be put to text. The aim of such application is to show that population is a meaningful conception to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6 Political Cultural Analysis of European Movement Party's Formation: Twin Paths of Post-modern Value and Pluralism

by Gao Qiqi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movement party's formation so far mainly focuses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entry threshold theory and spatial model of party competition. The last three theories are structural analysis, but these structural analyses neglect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issue in political cultural perspective from the approaches of post-modern value and pluralism. The combination of Inglehart's post-modern value analysis and Dalton's alignment strategic analysis can clearly describe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ovement party's formation. The appearance of differential pluralism provid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legitimacy support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 movement to movement par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mart power" *by Jiang Tao*

As a new U. S. diplomatic strategy, "smart power" is a new way adopted by the Obama government through intelligent use of softpower and hardpower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develop relations by contact and consultation and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multiple mea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mart power", there have been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U. S. diploma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s expected to enter a period of stable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17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of Periods afte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y Zhou Yongsheng & Masahiro Horie & Ding Anping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elations into four periods: the early honeymoon period, the latter honeymoon period, the co-existence of two main powers period and the role reidentification period, taking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as the main factor and the major events as the beginnings and endings for these perio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onship of the four periods.

25 On the Influence on the World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Regime

by Zhang Huiyu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all-round enhanc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hina took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regime. The influence, produced by China's participation in